

# 南管夢華錄：殖民統治與聲音媒體

時間：112年8月27日(日)14:00-16:00

地點：彰化南北管音樂戲曲館

主講人：王櫻芬(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主持人：巫炯寬(彰化縣文化局傳統戲曲及文化資源科科長)

與談人：林吳素霞(南管戲曲保存者(人間國寶))

記錄：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

南管是起源於閩南地區的古老樂種，在泉州、廈門地區稱為「南音」，演奏時以「上四管」為主，即洞簫、二絃、三絃、琵琶，再加上演唱者手執以五片長形木塊製成的「拍板」(簡稱拍)。「上四管」外，另有「下四管」，即響盞、四塊(又稱四寶)、雙音(又稱雙鐘、雙鈴)、叫鑼等四種打擊樂器，若再加上「玉噀」(俗稱噀仔，即小噴吶)，稱為「十音會奏」，簡稱為「十音」。南管音樂的內容可分為指、曲、譜三類，「指」與「曲」皆是帶有辭的樂曲，但「指」以器樂演奏為主，通常不唱，共有四十八套，每套由數曲組成；「曲」的數量最多，為南管音樂的最主要部分；「譜」是無辭的純器樂曲，數量最少，共有十六套，每套數

## 南管樂器介紹



[https://trd-music.tnua.edu.tw/zh\\_tw/Admissions/Q&A/傳音系的南北管主修是哪種樂器-90099305](https://trd-music.tnua.edu.tw/zh_tw/Admissions/Q&A/傳音系的南北管主修是哪種樂器-90099305)

圖一：南管樂器圖示(圖片來源：講者簡報)

節。南管隨著閩南移民遷至臺灣、香港、東南亞等地，由僑胞以業餘曲館的型態遍存各地僑社。過往南管研究以口述歷史為主，如 80 年代對鹿港地區南管樂的口述歷史研究，不過 2000 年後，諸多日治時期（1895-1945 年）的史料陸續整理完善，為學界提供了新材料重新認識南管。本次講者王櫻芬教授便是長年研究南管的代表性人物，其與臺大圖書館和漢珍公司合作完成的「臺灣日日新報聲音文化資料庫」，收錄有 36 萬筆資料，包含大量研究南管的素材；而臺大圖書館「78 轉唱片資料庫」也收錄了約 6,000 張唱片，其中亦不乏南管錄音作品。王教授另外運用了日本大阪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所收藏之海外殖民地的古倫美亞唱片，以及東南亞地區、特別是新加坡的報紙資料庫，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南管樂的傳播史及聲音媒體（如唱片、廣播）的運用情況，有別於過往仰賴口述歷史的研究傳統，填補了臺灣本土音樂研究之不足。2016 年時，王教授的研究成果獲頒科技部（今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為首位獲得此獎的音樂學者，尤為難得。



圖二：（左起）：人文沙龍計畫主持人陳國榮教授、與談人林吳素霞老師、主講人王櫻芬教授、主持人巫炯寬科長

講座初始，王教授談及「臺灣日日新報聲音文化資料庫」是以《臺灣日日新報》所載有關聲音報導匯集而成，該報於 1898 年開始發行，乃是由臺灣總督府主導，將《臺灣新報》與《臺灣日報》合併所設立。正因官方支持，該報成為臺灣日治時期的第一大報，其最高發行量曾達 5 萬份之多，也是日治時期臺灣發

行時間最長的報紙。<sup>1</sup>《臺灣日日新報》原以日文版為主，兼有數頁漢文版，1905年時將原有漢文版擴充獨立發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每日約有六個版面，直至1911年廢除，恢復為內加兩頁漢文版的形式。日治初期南管並未成為臺北地區的主流，1897年10月24日的《臺灣新報》即稱：「近時又有喜學南管者，雖聲調平淡，卻有些悠永之意。然臺北久尚北調，而南管雖終然不能與北調抗席。」所謂「北調」即是京戲。不過到了1906年6月19日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刊載總督官邸夜宴狀況時則稱：「則於廊下對面中央。架設舞臺。備極華美。可以而觀之。內地人藝妓。演將門菊重一齣。神情態度。俱極婉妙。繼以本島人十名。奏十音清樂。旋奏蓄音器。觀眾精神。為之一振。次藝妓復演道成寺一齣。」其中，由「內地人」（日本本土國人）演出的「菊重」、「道成寺」當指日本傳統藝能劇目，而「本島人」之「十音清樂」（南管）得以躋身總督官邸內演奏，並與「內地人」聯袂演出，可見其地位已有改變。



圖三：臺灣日日新報聲音文化資料庫網站（圖片來源：講者簡報）

王教授認為南管地位得以提升，有兩個重要事件，其一為1908年慶祝臺灣縱貫鐵路完成的「鐵道全通式」<sup>2</sup>，另一是1923年攝政宮皇太子裕仁親王（1901-1989，後即位為昭和天皇）造訪臺灣各地巡視的「東宮行啟」。1908年10月15

<sup>1</sup> 1944年，臺灣總督府下令將《臺灣日日新報》等六家主要的報紙合併為《臺灣新報》，然僅發行一年多，便因日本戰敗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管，更名為《台灣新生報》。

<sup>2</sup> 臺灣西部的南北縱貫鐵道實為1908年4月完工，然因鼠疫流行，延至該年10月舉辦通車儀式，由閑院宮載仁親王（1865-1945）代表天皇抵臺，自基隆上岸後，先於臺北停留，再轉往臺中參與24日之通車儀式（儀式於臺中公園舉辦，園內著名景點「湖心亭」即為紀念此事而興建），之後又轉往臺南、高雄參訪。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載：「本島絃管樂師。南北中三部地方。各處俱有。然欲求其能審音協律。而應絃合節。脈脈貫通者。則推中部鹿港一隅。茲值全臺縱貫鐵道舉行全通祝式。又逢閑院宮殿下駕臨。本島臺北紳商。擬欲延聘一班南管樂師。歡迎殿下。並祝鐵道全通之盛典。特欲藉此雅樂。以揚和聲鳴盛之概。爰於本月五日折東至鹿。延請施學吝、吳錦登兩氏親赴臺北。」為迎接載仁親王造訪，臺北紳商特別延攬鹿港樂師親赴教學。參與迎接載仁親王的臺北仕紳又於 10 月 28 日應邀至臺灣鐵道旅館（台湾鉄道ホテル）<sup>3</sup> 夜會，席間臺北仕紳二十人也演奏了南管。此次事件使南管在仕紳和日本官方的支持下享有特殊地位，帶動學習風氣，成為臺灣音樂代表，如 1910 年 8 月 6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載集絃堂因「蒙閑院宮殿下稱許而奮發圖強」，故「自泉州特聘名師」教學，於艋舺龍山寺合演十日，計演出指 22 套、譜 12 套、曲數百套。1910 年 10 月 12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又載：「稻江曲界，因以北管為盛，近期漸變而南」，由此可見一斑。

以集絃堂為例，當地仕紳、茶商的支持尤為重要。如 1912 至 1914 年先後擔任值東者有板橋林家後人林嵩壽（1886-1934）、茶商洪韞玉（?-1919）及曾任茶商公會會長的陳朝駿（1886-1923）；另一為曾任茶商公會會長的吳文秀（1873-1929）也是贊助者。其中洪、陳、吳皆來自廈門，也使其由原鄉禮聘泉、廈樂師渡海來臺，如 1913 年 9 月至 11 月間《臺灣日日新報》陸續報導集絃堂與聚英社每年舊曆八月十五於艋舺祖師廟、龍山寺競奏半個月，前者於泉、廈招聘能手，後者則自汕頭延攬大家；1913 年 10 月 19 日《臺灣日日新報》記集絃堂例會，由陳朝駿邀請廈門音樂名家林祥玉、阮順永、徐名揚、王增元、白向榮、戴梅友、林坤垠、胡俊英等八人來臺，其中林祥玉留任至隔年，並於臺灣出版南管著作。1923 年 4 月間，皇太子裕仁應時任臺灣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邀請來臺訪問，據 3 月 28 日《臺灣日日新報》載臺北市奉迎委員會決議備辦數項事物迎接裕仁，其中第五項即陳朝駿負責之「清樂」，將由廈門、臺北名人五名擔綱演奏，五名作為預備（陳氏即為預備人選），曲名為「百鳥歸巢」。王教授據《田健治郎總督日記》所記，田健治郎為求慎重，事先於 3 月 31 日試聽，其云：「樂器五種，拍子、琵琶、洞簫、胡弓、三絃是也，稱南管五音雅樂云。音調極靜雅，高尚則有，快樂猶未。吹奏約二十分而了。」據 4 月 19 日之《臺灣日日新報》及「實業之臺灣社」出版《皇太子殿下臺灣行啓紀念：光榮ありし日》（頁 105-106）所載，裕仁於 17 日午後 4 點 35 分凝聽，文中並指出，樂曲「百鳥

<sup>3</sup>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直營之西式旅館，第一位下榻人士即載仁親王。該建築於 1945 年臺北大空襲中被毀。

歸巢」涵義為「如人民悅服於皇上聖德」；4月23日《臺灣日日新報》又載，時任首任臺北市市尹的武藤針五郎（1870-1926）於鐵道旅館設宴款待御前奏樂之樂人十人，宴後眾人又演奏「百鳥歸巢」，強調為表達「萬億臣民仰慕盛德之意」。裕仁來臺後，再次帶動南管學習風氣，集絃堂等團體陸續設立俱樂部，延攬泉廈樂師赴臺駐館教學，集絃堂及「百鳥歸巢」也成為御用團體及曲目。

若從傳播聽覺媒介的角度來看，日治時期的廣播對臺灣社會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日本本土的實驗播送早在1922年初開始，1925年東京放送局（JOAK）正式設立，當時臺灣總督府便著手考慮接收日本內地廣播電波之有關事宜，其目的在於藉由接受本土廣播進行中繼（即轉播），強化臺灣與本國間的聯帶關係，然而是否於臺灣設置電臺仍有諸多意見。直至1928年底，臺北放送局（JFAK）以官設電臺的名義開局播送，並陸續於臺南、臺中、民雄、嘉義、花蓮等地成立放送局，然主要針對在臺日人，1942年底才出現針對臺灣人的「二重放送」。據王教授統計，1929至1945年間每年南管的廣播次數不等，如1933年高達29次，而1938年僅有一次，再據北中南各區域樂社演出及南管唱片出現廣播的次數與比例來看，總次數有233次，臺北的192次占全體82%，臺南與鹿港約各占4%，播放唱片則占10%。南管在廣播中的特殊地位，不僅在皇族相關奉祝活動（如誕生新成員）或始政紀念日放送，也在重要場合中代表臺灣音樂，如1934年9月9日首次全國廣播中繼時，即有臺北長春閣南管合奏、臺北雅頌閣文樂合奏。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共計有12次全國中繼，南管僅出現在首次和另一次，但爆發後6次中繼有3次都是南管，1次是南管外加歌謠曲和揚琴獨奏。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的7月16日晚上起，日本政府陸續以福建話、北京話、英語、日語、廣東話、馬來語、越南語進行海外廣播放送，以為政治宣傳，作為「南進」策略的一環。除各別語言的使用，廣播節目的製作也力求貼近各地聽眾心理，運用當地喜好的音樂，針對南洋地區的閩南移民群眾便是播放南管音樂。事實上，當時的中國政府也同樣以廣播對南洋地區播放，亦採用南管樂爭取僑胞認同，形成不同政權卻同樣運用聲音媒體進行競逐與政治宣傳的現象。

相較於廣播的官方性質，南管唱片的發行及銷售則更受商業機制影響。在1932年之前的唱片內容多為京劇京調、南北管，1932年後則漸被新興本土樂種取代，如新款歌仔戲、臺語流行歌成為主流，客語次之，南管、北管數量降低，京調、小曲幾乎絕跡。各唱片公司所發行的南管唱片，以商標作為區分，則以日本蓄音器商會（簡稱「日蓄」）的東洋駱駝、鷹標（Nipponophone）、古倫美亞、黑利家，以及朝日蓄音器株式會社所發行的鶴標為主，其中後者更外銷

至南洋地區，如於新加坡所留存的銷售歌單廣告中便可發現。王教授指出，30年代是臺灣唱片和廣播蓬勃發展的時期，當時臺灣的傳統樂人如何看待唱片與廣播帶來的刺激，又是如何面對歌仔戲、臺語流行歌興起的衝擊？她以著名樂人潘榮枝(1905-1947)為例，其作為南管傳統的保存者，曾於臺灣各地任教；也作為創新者，與唱片業人士組成「臺灣新東洋樂研究會」進行漢樂器改良，演出漢樂合奏和流行歌，其作詞作曲的臺灣歌謠曲〈正月鬧〉也在廣播中演出。在唱片方面，潘氏曾為日東和聖樂唱片灌錄南管傳統曲目，也為聖樂發行的現代笑話配樂中安插歌仔戲和南管曲調；為古倫美亞的兩套歌仔戲唱片配樂時，以南管傳統曲調填入新詞。此外，他更創作兼具南管特色和探戈節奏的流行歌曲〈春宵雨〉，將南管爵士化，他的大膽嘗試，為臺灣歌曲界留下了罕見的南管流行歌曲。值得一提的是，潘氏雖勇於將南管與其他樂種進行跨界融合，但仍嚴守南管的分際，如不論是演奏新創或傳統曲目，大多謹守南管上四管伴奏唱曲的原則，並未讓非南管樂器參雜，頂多是簡化為簫、絃兩管。其為道教法教相關曲目配樂時，也加入南管下四管樂器；在為歌仔戲創作南管插曲時，也按照其原有的填詞度曲原則進行創作，因此其所創作的南管曲仍符合舊有曲調分類方式。簡言之，潘榮枝以南管樂手、配樂者、作詞者、作曲者等不同身分活躍於廣播和唱片界，勇於將南管融入其他樂種，卻不讓其他樂種入侵南管，顯示其創新中仍維護南管傳統的精神。



圖四：林吳素霞老師(右一)和彰化南北管音樂戲曲館學員於講座現場演奏

本場講座也特別邀請被譽為「人間國寶」的林吳素霞老師擔任與談人，她出身南管世家，是第一位傳授南管技藝的女性「館先生」，長年於臺灣各地學校、館閣、社團任教，亦多次受邀遠赴他國演出，於 2010 年獲文化部登錄為「重要傳統藝術南管戲曲保存者」。林吳素霞老師亦帶領彰化南管實驗樂團於現場演出指、曲、譜三類，讓現場聽眾品味南管「叫字」（即咬字）一字多腔的婉轉韻味，以及曲調、節奏徐緩古雅的風貌，為聽眾帶來一場聽覺饗宴。